

# 语言选择研究的后现代特征<sup>\*</sup>

田海龙 张迈曾

(天津商学院,天津 300134;南开大学,天津 300134)

**提 要:**语言选择是功能语言学、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普遍涉及的一个研究课题。从语言选择的对象和目的两方面看,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对语言选择的研究具有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对西方主流语言学进行反思的共性,但是这种影响的程度不同,而且各自也具有不同的研究视角。认识这些特点不仅有助于探索其各自背后的语言哲学思想,而且有助于挖掘对语言研究的意义。

**关键词:**语言选择;语言思想;后现代主义;特征

**中图分类号:** B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07)06 - 0008 - 5

## Late Modernity in the Multiple Approaches to Language Choice

Tian Hai-long Zhang Mai-zeng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Tianjin 300134, China; Nankai University, Nankai 300134, China)

Language choice is a topic in functional linguistics, pragmatics and sociolinguistics. The multiple perspectives in the three approaches to language choice bear the influences of late modernity and carry with them a rebellion of the western mainstream linguistics. Reviewing the functional, pragmatic and socio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language choice in terms of its options and aim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language ideologies underlying the approaches from the viewpoint of late modernity.

**Key words:** language choice; language ideology; late modernity; features

语言选择是语言使用者在交际过程中不断选定语言或语言形式进行交际的一种语言行为。总体来讲,对语言选择的研究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是对主流语言学的反思。语言选择构成功能语言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研究的课题。语言选择的多视角研究打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统天下,形成了语言研究的百舸争流。本文从语言选择的对象和语言选择的目的是两方面来讨论功能主义语言学、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对语言选择的研究,试图在后现代主义的大视野中考察其各自研究的特点,并探索这些研究反映出的不同语言思想及其对语言研究的意义。

### 1 功能语言学的语言选择研究

韩礼德的功能主义语言学将语言描写成“一个在语言使用中实现的意义潜势系统”(Thompson 2000/1996: 221)。意义在这里已不再是结构

主义语言学中与具体语境相脱离的抽象意义,而是与语境相关的意义,是说者希望听者理解的具体意义。功能主义语言学的意义即是语言在具体语境中的“功能。”要获取信息,可能就要使用疑问句而非陈述句,而且从朋友处获取信息时使用的疑问句可能是随意的而不是正式的文体。这些与语境密切相关的成分都构成意义的一部分。

研究语言的功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选择的问题(Thompson 2000/1996: 8)。韩礼德的功能语法就是要研究选择的范围,一方面从需要表达的意义(功能)出发进行研究,另一方面从表达这些意义(功能)需要的措辞出发进行研究,但不论从哪个角度进行研究,都要使两套选择项相互匹配。从功能出发,就要考虑语境的问题:决定某种意义(功能)比另一种更为合适得体的语境因素是什么?但是,功能主义语言学把研究的重点更多地放在选择的另一方面:表达语境所要求的意义(功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汉语篇章批评性分析研究》(03BYY024)的阶段性成果。

能时,哪一种语言选择项更为合适。语言选择系统提供许多词汇和结构方面的选择项,语言选择的对象在功能主义语言学看来就是语法规则。功能主义语言学在研究这些选择项被选择来表达意义功能的同时,建立起以人际功能、概念功能和语篇功能为主的系统功能语法。

我们从具体的语言选择实例来看语言选择与语言功能的联系。

海南、贵州、云南、西藏、青海、新疆 6 个省份未发现疫情。

我们没有在海南、贵州、云南、西藏、青海、新疆 6 个省份发现疫情。

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发布病例报告时选择的话语。在要求客观报告病例这样一个具体语境中,选择无生命主语,不参杂主观意见,客观的报道疫情。如果像那样选择有生命主语,就不可避免地夹杂了许多主观色彩。功能主义语言学将这种选择系统称为语言的人际功能。根据功能语法,人际功能由“语气”和“情态状语”来实现,语气又由句子的“主语”和“限定成分”构成,情态状语分成“评论状语”和“语气状语”。句子的主语选择有生命的主语或无生命的主语就可在语气方面构成语言的人际功能。这里,语言选择的对象不是一个具体的词语,而是系统化为语法规则的主语,语言选择的目的是实现语言的人际功能,决定语言选择的因素是语境。

全国内地 14 个省份有非典型肺炎病例报告。

全国内地 14 个省份发现非典型肺炎病例。

是病例报告的实际选择。根据功能语言学,人们用语言谈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中的事物、时间、情态以及对世界的认识(包括感情、信念和思想等),构成语言的概念功能。“有……(报告)这一句式表达的是属有型的关系过程(彭宣维 2000: 245),“发现”这一动词表达的是物质过程。虽然和所表达的命题意义无大区别,但是选择关系过程在更大程度上表明所述事物的真实,表明它具有“客观性”(Kong 2001)。这里,语言选择的对象不是一个具体的词或句式,而是系统化为语法规则的过程;语言选择就是根据语境的需要选择一定的“过程”来实现语言的概念功能。

功能语言学通过对主位成分的选择来建构语言的语篇功能。例如:

5月8日10时至5月9日10时,各地报

告新增非典型肺炎疑似病例 144例。

各地5月8日10时至5月9日10时报告新增非典型肺炎疑似病例 144例。

在这两个句子中,的主位由于不与句子的主语重叠,成为标记性主位。病例报告实际选择标记性主位,是说者刻意引导听者注意其“意义/功能”的一种选择,具体来讲,就是说者的意图是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时间区间上。这里,语言选择的对象也是系统化为语法规则的主位成分,选择的目的是实现语篇功能。

功能主义语言学的进步在于,它摈弃了结构主义语言学中关于意义靠语言系统内部的相互关系确定的理论,提出意义的功能学说,把意义扩展到语言的功能系统,通过研究语言选择确立意义的动态特征。然而,功能语言学忽略了认知主体在意义建构过程中的作用。功能主义认为决定语言选择的因素是语境,并非主观意识。人在语言交际中选择什么语言或语言变体完全由语境决定,人只是被动地接受这种选择。另外,功能主义只是研究了语言选择的原理,归纳出一些可供选择的语法规则,即一套一套的选择项,或称之为选择系统(systems of choices)。功能主义语言学在提出语言是意义潜势系统理论的同时,其试图使语法规则系统化的语言思想仍禁锢在结构主义所追求的统一性、整体性和永恒性之中。

## 2 语用学的语言选择研究

语用学以研究语言运用为己任,对语言选择的研究较功能语言学更为具体,提出“运用语言必须包括不断进行的语言选择”(Verschueren 2000/1999: 55)。这种语言选择可能基于语言内部或和外部的原因,也可能是在不同意识程度下作出的,但是,选择的过程被看作描述语言运用的基础(Verschueren 2000/1999: 58)。

从语言运用即是语言选择这一命题出发, Verschueren (2000/1999: 59 - 63) 提出有关语言选择的三个关键概念: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变异性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这不仅仅是传统的地域、社会或功能意义上的语言变体,而且是各种可选择项的整体范围;这个范围是不断变化的,不是固定静止的。商讨性指语言选择不是机械地严格按照规则或固定地按照“形式-功能”关系作出,而是在高度灵活的语用原则和语用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没有规则决定使用这个语言形式而不使用哪个语言形式,有的只是可操作的原则。这意味着许多不确定性。有来

自言者的不确定性,也有来自听者的不确定性,还有来自选择本身的不确定性。选择本身就是动态的。顺应性是指语言使用者在能供选择的语言项目中作出灵活的选择,从而尽量满足交际的需要。

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是既相互联系又有等级差别的三个概念。相互联系表明,没有语言的变异性就没有商讨性和顺应性;语言没有各种各样的变体,选择就无从谈起,也就无所谓商讨性和顺应性。等级差别在于语言的这三个特点有着严格的顺序。语言首先具有可供选择的一系列语言变体才会导致语言运用由不断的语言选择构成,而语言运用一旦成为根据不确定的原则和策略从多变的可供选择的语言变体中进行选择,交际的成功只能靠顺应来保证了。

语言的变异性表明,语言选择的对象不再是功能语言学中的语法规则,而是实际运用中的语言或语言形式,包括语音、词汇和各种语言策略。语言选择的目的是在语用学看来就是交际的成功。Verschueren基于语言选择的研究提出顺应理论,就是分析人们在交往过程中,为了使交际顺利进行,交际双方要不断进行语言选择,以彼此顺应。语言选择在语用学的研究中被看成交际双方寻求共同点的工具。语用学关于语言选择研究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在于追求语言研究的动态特征。语言运用是不确定的,是无规则可循的,要保证交际的成功,只有在实际的语言运用中根据变化性极强的原则和策略不断的进行语言选择和商讨。

### 3 社会语言学的语言选择研究

功能语言学基于对语言选择的研究,提出语言的三种元功能,为语言分析提供了一种理论模式。Verschueren从语言选择的研究入手,提出顺应理论,使语用学成为一种理论综观。社会语言学更注重语言选择在社会情景中的实际意义,注重研究语言选择与选择者身份地位、思想意识及其所从事的社会实践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以语言变异研究为重点的早期社会语言学中主要表现在语言选择反映出选择者的身份地位方面。Labov对纽约市三个百货商店的语言调查就是变异社会语言学在这方面研究语言选择的一个代表。这三个商店从地理位置、刊登广告的报纸的读者群、所售商品的价格、商店内的环境以及员工的工作条件和工资几方面都有等级差别。他对这三个商店的264名售货员问了同样一个问题:Excuse me, where are the women's shoes? 售货员回答:Fourth floor 售货员在发[r-]这个音时反映出的差别与

其所处的商店等级差别相一致。“售货员由发[r-]音的不同比例造成的差别与商店在语言外部因素方面的等级差别顺序完全一致”(Labov 1997/1972: 175)。

Labov的语言变异研究虽然涉及到语言的选择与社会身份地位的关系,但这种选择和功能语言学及语用学一样,被看作无意识的选择,所以语言选择只能是被动的显示语言变体与社会等级之间的单一联系。与Labov不同,另外一些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表明语言选择是选择者表达自己思想意识和主动参与社会实践的一种方式。这里我们集中讨论Gal和Heller的研究。

Gal(1998)观察了奥地利东部欧伯沃德小镇年轻妇女选择德语或匈牙利语的情况。欧伯沃德是当时农业欧洲向工业化和城镇化转型进程的一个缩影。在欧伯沃德,匈牙利语象征着农民的社会地位,在日常生活中选择匈牙利语意味着与农民的牵连。而德语由于象征着工业化,在人们心中享有更高的威望和更正面的联想。这只是德语和匈牙利语价值的一般情况,考虑到性别、年龄和社会网络等变量因素, Gal发现:(1)男性居民中,年轻一代使用德语比老年一代多;而且每一代人在交谈对象不是农民时使用德语最多。(2)女性居民中,年轻妇女使用德语比任何一组人都多,甚至比年轻男性还多;这些年轻妇女与农民交谈时几乎和与非农民交谈时一样不用匈牙利语。Gal特别解释了年轻妇女频繁使用德语的动机。这些年轻妇女不顾她们的交谈对象是否是农民,一律使用德语进行日常交流,表明她们向往一种新的社会身份。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社会转型期,农民的社会地位不再受到崇敬,尤其对年轻妇女来说,嫁给一个工人意味着幸福生活的开始,所以,她们极力选择象征工业化的德语进行交谈,不是为了适应交际对象的需要,也不是为了交际的成功,而是要通过语言选择来表明自己的思想意识,来代表自己向往的新的社会身份。她们拒绝使用象征农民地位的匈牙利语可以被看作她们拒绝农民身份和农民生活整体活动中的一部分。她们不想做农民,也不想用语言体现出自己是农民。她们通过语言选择实现了社会转型期间自己社会身份的变化,使语言选择成为她们参与社会变革的语言形式。

与Gal对社会个体通过语言选择参与社会实践的研究不同, Heller(1995)的研究涉及到机构通过语言选择实施象征性控制(symbolic domination)的问题。象征性控制指社会集团通过将自

己的观点和文化实践确立成最有价值的标准来保持对其他社会集团的控制。语言实践可以建立机构的规约,而语言的规约是机构规约的一个组成部分。标准的知识是机构中特许的专家的知识,用来更好的完成机构的使命,因此,也是统治阶层的文化产品。统治阶层通过赋予某种知识形式合法性,通过限制获取有价值的知识的渠道,来实施象征性控制。Heller就是通过研究加拿大安大略省法语教育的情况,说明学校作为机构如何通过选择语言来实施象征性控制的。在加拿大,魁北克省以外的法语处境十分艰难,在安大略这样说英语的省份,说法语的人为数不多,他们采取不同的方法试图建立法语自治区,尽管不是领土意义上的自治。其中一个使其努力合法化的策略就是强制建立法语区,由此,L'Ecole Champ lain 高中成了这些讲法语的人在安大略享有单一法语特权的社区。这里,语言选择成了社会集团实现自己价值观念、并把这种价值观念强加给他人的工具。通过象征性控制,学校机构将法语规定为学校的单一语言,并将学校建立成单一的法语社区,这是语言选择的结果,同时也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它可以使说法语的人受益,同时又使说法语的人脱离了英语世界。在这所学校里,中产阶级的子弟因为要继续升学,比较遵守学校的规定,自觉说法语;那些工人阶级和非洲血统的孩子因为回家要讲英语,就不大遵守学校说法语的规定。象征性控制下的语言选择成了一把双刃剑。

社会语言学将语言选择的对象进一步扩展,同时,对语言选择目的的认识进一步深化。语言选择的目的是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中不是表示语言的功能,也不是交际得以成功进行的工具,而是语言选择者构建自己社会身份、地位、参与社会变革的手段。语言运用者的主体位置被真正确立起来,从而动摇了将语言与语言使用者分离、孤立研究语言封闭系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根基。

#### 4 语言选择研究的后现代主义特征

对语言选择的多视角研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语言研究方面的反映。“后现代不是一个新时代,它是对现代性所声称的某些特点的重写”(利奥塔 1997)。在语言研究方面,后现代主义追求语言研究的多视角,摈弃结构主义的一统天下,追求语言研究的动态特征,摈弃静态的、封闭的语言系统研究。后现代主义要求重新确立“意义观”,认为意义是认知主体主动建构的结果,而不是靠系统内部的相互关系来实现和确定的某种实体或

关系。后现代主义要求重新考虑词与物的关系,认为符号的能指不但与所指密不可分,而且还会反过来影响所指(于鑫 2003)。

纵观语言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语言研究的后现代特征是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各种语言思想的发展结果。根据福柯(2001)对“认识形态(episteme)的研究,在文艺复兴时期(14-16世纪),人们根据相似关系从已知中发现未知,所以语言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相似性原则”的基础之上,语言与事物难以区分,语言如同植物、动物一样是世界的一部分,是神秘而模糊的事物。在古典时期(17-18世纪),语言从存在物中退了出来,成为透明和中立的符号,此时,“意义的概念出现了,词与物之间的关系呈现出“表征性”,即词用观念去表征事物。在现代时期(19世纪),表面的表征让位于对深层规律的探索,人们已不满足于建立“语法”这类词语表达事物的秩序,而是热衷于语音和语法系统中的规律。为探求词与物之间的“深层次”关系,历史比较语言学应运而生。在当代(20世纪),结构主义语言学盛行,词与物被完全分离,符号仅指涉其他符号,而不指涉外界事物;语言被看作一个独立自主的结构体,是一个以任意性为基础的具有层级的符号系统。20世纪下半叶以来,语言研究的后现代化迫在眉睫(季国清 1999)。

从后现代主义对语言研究的影响来看功能语言学、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对语言选择的研究,可以发现它们都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的思想特征。它们都摈弃结构主义僵硬的语言思想,摈弃静态的、封闭的语言系统研究,转向研究动态的、不确定的语言运用,认为意义不是事先确定的,而是构建的结果。功能主义语言学的后现代特征可以用 Kipert的“互补性”和“不确定性”(Kipert 2003: 184-188)来概括。Halliday摈弃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学说,侧重研究语言运用,并把语言系统和语言运用联系起来;根据功能主义的语言选择研究,语言功能由语境对语法规则的要求来实现,语境的变化决定语法规则的选择,意义不再是事先确定的字面意义,而是实际应用中通过语言选择来实现的功能,从而确立了意义/功能的动态特征。语用学的语言选择研究对语言运用的不确定性更是明确再三。这首先体现在选择对象的扩展。语用学的语言选择对象不是固定的语法规则,而是实际运用中范围不确定的语言要素,包括语音、词汇,也包括语言策略,甚至“活动”(action)这类非语言的交际因素也被纳入选择的范

畴 (Scollon & Scollon 2003)。除此之外,语言运用的不确定性还体现在语言运用的商讨性方面。语言选择是无规则可循的,有的只是可变性极强的原则和策略 (Verschueren 2000: 61)。社会语言学将语言选择研究置于广阔的社会环境之中,将语言选择的对象进一步拓宽到“语体 (style/genre)”、“语步”(moves)、“语码转换”(code-switching)等,而且社会语言学对语言选择目的探索也触及到研究语言选择与选择者社会地位、思想意识及其所从事的社会实践的关系,把语言研究与社会课题紧密联系起来。总之,功能语言学、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对语言选择的研究都体现出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语言研究方面的影响,带着反叛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特征。

尽管功能语言学、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对语言选择的研究在整体上都体现出语言研究的后现代特征,但是,其体现的程度有所不同。这反映在对语言选择的意识程度存在认识上的差异。Thompson (2000/1966: 8)提请读者注意,“选择”这个词并不一定指说者有意识的选择过程。Verschueren (2000: 56)也指出,“选择”这个术语如果总是表明一个有意识的行为就起误导作用了。显然,功能语言学和语用学倾向于语言选择具有无意识特征,认为多数语言选择是人们无意间作出的选择,或是人们在具体情景中本能的顺应行为。与此相反,社会语言学更倾向于语言选择是有意识的,是语言使用者为构建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主动作出的选择。这种对语言选择意识程度的认识差异反映出功能语言学、语用学和社会语言学所体现的语言研究的后现代特征在程度上存在的差异。结构主义语言学把语言看作一个独立自主的结构体,试图在语言系统内部对语言进行静态研究,找出语言中稳定的、一成不变的内部规律。对这种主流语言思想进行反思,就必须研究语言主体,研究语言使用者如何运用语言。把语言选择看成无意识的选择,对语言选择的研究只会囿于没有语言使用者的语言研究,即使拓展到研究语言选择与社会的关系,也只能停留在语言选择的反映功能上,如 Labov (1972) 研究中语言选择反映出选择者的社会身份。只有将语言选择视为有意识的选择,视为选择者主动的选择,话语

才能成为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这一至关重要的语言思想体现了语言选择研究、乃至整个语言研究的后现代特征。

#### 参考文献

- 福柯. 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 [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1.
- 季国清. 语言研究的后现代化迫在眉睫 [J]. 外语学刊, 1999 (1).
- 利奥塔. 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 彭宣维. 英汉语篇综合对比 [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于鑫. 后现代主义背景下的语言符号研究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 (3).
- Gal, S. Peasant Men Can't Get Wives: Language Change and Sex Roles in a Bilingual Community [A]. J. Coates, (ed). *Language and Gender: A Reader* [C]. Oxford: Blackwell, 1998.
- Heller, M. Language Choice,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Symbolic Domination [J]. *Language in Society*, 1995 (24).
- Kipert, Diana. Getting the Fuller Picture: a Reflection on the Work of M. A. K. Halliday [J]. *Language Sciences*, 2003 (25).
- Kong, Kenneth C. C. Marketing of Belief: Intertextual Construction of Network Marketer's Identity [J]. *Discourse & Society*, 2001 (12).
- Labov, W.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r) in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Stores [A]. Coupland, N. and Jaworski, A. (eds). *Sociolinguistics: A Reader and Coursebook* [C].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1972.
- Scollon, R. & Scollon, S W. *Discourse in Place: Language in the Material World*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Thompson, G. *Introducing Functional Grammar*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Edward Arnold, 2000/1996.
-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Edward Arnold, 2000/1999.